

冯天瑜 邓建华 彭池 编著

古人和近人对于中

国学术流变的论述，或

良或莠，或深或浅，却

弥足珍视，因为它们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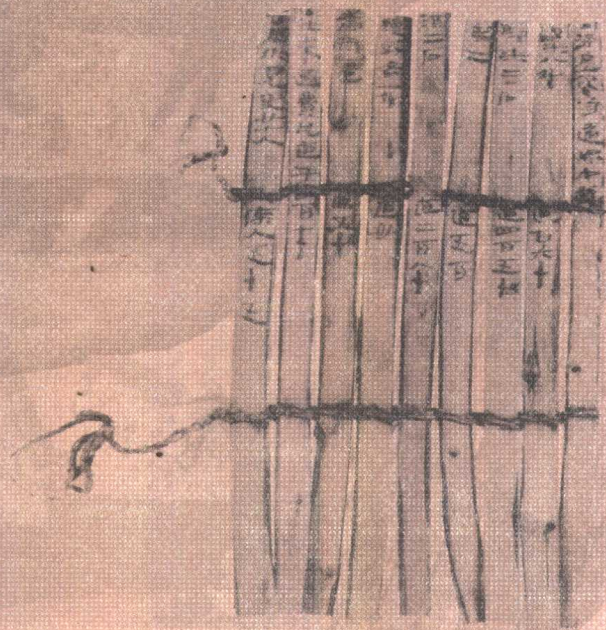
以为我们提供思维教训

奠定开闢而坚实的前进

基地。
冯天瑜

中国学术流变

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冯天瑜 邓建华 彭池 编著

古人和近人对于中

国学术流变的论述，或

良或莠，或深或浅，却

弥足珍视，因为它们可

以为我们提供思缘教训

奠定开阔而坚实的前进

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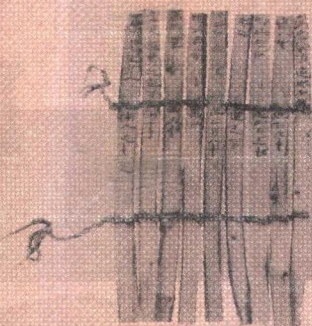
冯天瑜

中国学术流变

下 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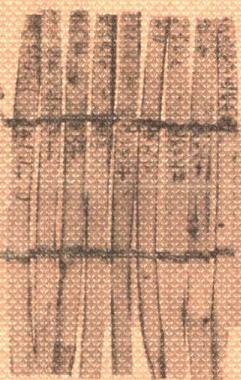


ISBN 7-5617-30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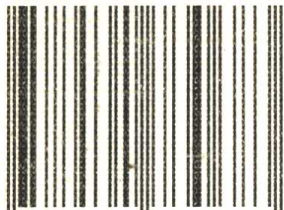


9 787561 730683 >

定价: 48.00 元



ISBN 7-5617-3068-3



9 787561 73068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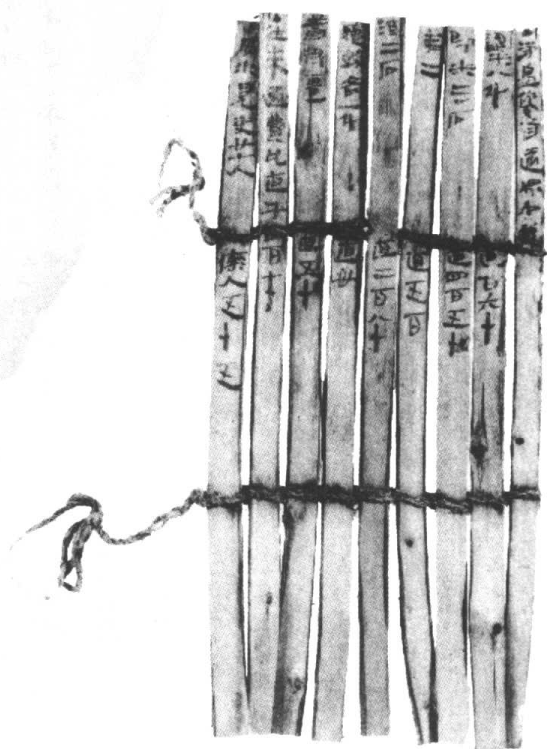
定价：48.00 元

冯天瑜 邓建华 彭 池 编著

中国学术流变

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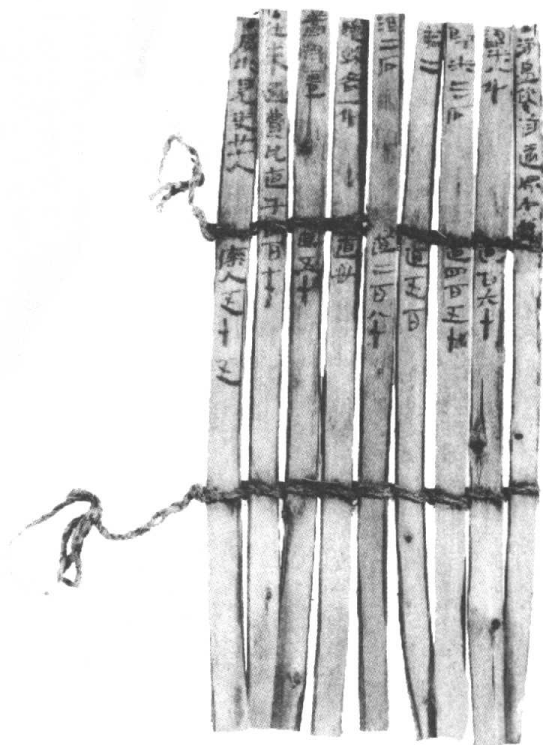


冯天瑜 邓建华 彭池 编著

中国学术流变

下
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 / 冯天瑜主编.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

ISBN 7-5617-3068-3

I. 中… II. 冯…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史料-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285 号

中国学术流变 ——论著辑要(下册)

编 著 冯天瑜 邓建华 彭 池

责任编辑 陈丽菲

特邀编辑 汪 宇

责任校对 郭绍玲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http: // 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26.5

字 数 725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一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7-5617-3068-3 / K · 225

定 价 48.00 元(上下册)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言

对学术史的把握,往往是通过通过对历代学术经典的重读得以实现的。

—

“学术”是一个联合结构的双音节词,由并列的“学”与“术”两个单字词组合而成。故为着把握“学术”的整体意义,须分释“学”与“术”。

“学”的本义为觉悟^①,引申为仿效^②、认识^③、学问^④、学习^⑤、学科^⑥;“术”原义为古代城邑的道路^⑦,从所取道路引申为权术、手段^⑧、技术^⑨。近人梁启超指出:“吾国向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辞。”^⑩先秦典籍《礼记》便有“学术”连用之例^⑪,后之史籍又屡有类例^⑫。这些

① 《说文解字》:“敎,觉悟也,从教门,门,尚滕也,臼声,学,篆文敎省。”《白虎通·辟雍》:“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

② 《广雅·释诂三》:“学,效也。”《论语·学而》集注:“学之为言效也。”

③ 《广雅·释诂二》:“学,识也。”

④ 《老子·四十八》:“为学日益。”河上公注:“学,谓政教礼乐之学也。”

⑤ 《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此处“学”作“学习”解。

⑥ “学”作为含“学科”义的后缀,组成一系列学科名词,如文学、数学、兵学等。

⑦ 左思《蜀都赋》:“当衢向術。”“術”为城邑道路。

⑧ 《礼记·祭统》:“惠术也,可以观政也。”此处“术”指权术、手段。

⑨ 《史记·货殖列传》:“医方诸食技术之人。”

⑩ 《学与术》,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

⑪ 《礼记·乡饮酒义》:“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

⑫ 《后汉书·盖勋传》:“凉州寡于学术。”《宋史·吴潜传》:“诏求直言,潜所陈九事……四曰:正学术。”

古典中的“学术”，皆统指一切学问，特别是指“即器以明道”的形而上认识，因此又称之“道术”，如《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有时则简称为“学”，如《韩非子·显学》所谓“世之显学，儒墨也”。《礼记·学记》所谓“论学取友”。

20世纪初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广泛接触学科分类明晰的近代西方学术文化后，不满意于古来学与术相混淆的笼统旧说，他参酌近代西方理论知识与技术知识相区别的思想，对“学”与“术”的内涵加以分疏：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①

梁氏还引述西方生计学（经济学）家倭儿格的言论，阐明学术的统合性：“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②

梁氏的辨析，其立意当然不限于语义学，它实际上是对以认知的综合性、学科的融通性（所谓“文史哲不分家”）为特征的传统学术作出一种超越尝试，昭示了中国学术从“通人之学”演为“专家之学”、从古典混沌奔往近代分疏（亦不忘综合）的方向。我们今日整理浩瀚的中国学术遗产，考察其错综的发展脉络，固然要充分尊重传统语境，真实反映中国学术史的整体性、综汇性状貌，不可强作肢解和拼组，但与此同时，又有必要以现代学术分科理念观照过往的学术史，审慎地对传统学术作出分类与要素解析，如此既能对传统学术深入底里，获得真解；又能探幽致远，追溯现代各门学科的渊源，描述“一致而百虑”的学术的发展轨迹。

① 《学与术》，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

② 《学与术》，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

二

近 20 年来,人们日渐重视文化史研究,这种研究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提供了观察历史和现状的新角度,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本民族和别民族文化创造的走向,以及诸民族文化间交融互摄的复杂过程,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辩证关系。文化史以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进程为对象,并特别注意人类创造文化时主体意识的演变,从而与考察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史和社会状况的社会史相区别。文化史研究应当致力于对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整合,以形成一种显示规律的记述,构成这种记述的材料,则选自己知文化资料的整体。而“已知文化资料的整体”应当包括“俗文化”资料和“雅文化”资料两大部类。“俗文化”指流行于大众民间的文化,它成自众手,是在一定时代形成于一定生活共同体的非理论化的社会意识;“雅文化”指社会上层文化,它经由职业精神生产者依靠已有的精神生产资料加工而成,较为系统、专门、定型,便于保存与传播。这两种文化的区分由来已久,我国自古便有俗乐、雅乐的对称,有风(民歌)、雅(宫廷诗歌)、颂(庙堂诗歌)的并列,有高跷、秧歌等民间游艺与“琴棋书画”等君子“雅道”的分野。然而,这两种形态的文化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相互渗透,彼此推引,雅文化要从俗文化中汲取营养,或者以其作为依托物,或者以其作为“补强剂”、“复壮剂”;而俗文化又受到处于统治地位的雅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在各阶层人们的欣赏趣味上,这两类文化也并非总是楚疆汉界,壁垒分明,“雅俗共赏”这一成语便反映了两种文化相通互动的事实。

如果说,俗文化更多依赖于民间生活习俗的递遭和大众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其文化资料(有的后来也笔之于书),那么,雅文化则主要是以经过认真加工的、精致的形态贮存其文化资料。在中国,“雅文化”的渊薮便是汇合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学术著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大体反映了中国雅文化的发展历程。如果我们同时

又注意于俗文化的研究,认真考察俗文化与雅文化的交互关系,便有可能对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纷繁错综的文化现象加以整合,形成一种显示规律的认识。从这一意义而言,治学术史是治文化史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

我国自古便有重视学术的传统,学术往往被推尊到至高地位。古人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①近人陈寅恪更指出,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②。而学术的累积尤为人们强调,所谓“水积则生吞舟之鱼,土积则生梗、楠、豫、樟,学积亦有生焉”^③。由于我国历来着意于学术的累积,于是有五经、六经,乃至七经、九经、十三经的确立和反复疏解,有前四史、十七史,乃至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的代代编纂,使中国学术延绵不绝,传统未坠,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连续性学术文化。中国学人在注意学术累积的基础上,又追求学术的“因时制宜”。“袭故而弥新”^④、“濯去旧见,以来新意”^⑤被认作是治学的高妙境界。加之中国本土学术不断汲纳外来学术(如南亚佛学、欧美西学),彼此融会,更增添源头活水,使历代学术各具丰采,前后辉映。总之,中国学术既代代相因,又新旧更替,内外融会,形成一种波澜起伏的万千气象。

中国学术史因其漫长复杂而带来研究的艰辛;也因其丰富多彩而引人入胜。事实上,我们的先辈已在这个困难而又饶有兴味的领域披荆斩棘,劳绩卓著。从先秦诸子开始,历代都不乏有识之

① 王符:《潜夫论·赞学》。

②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三百一十八页。

③ 《尸子·广泽》。

④ 陆机:《文赋》。

⑤ 张载:《经学理窟》。

士对前代和当代学术作“分其宗旨，别其源流”的工作，他们或者从微观(对某一学者)、或者从中观(对某一学派)、或者从宏观(对某一时代各学派以至纵观古今各学派)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穷源竟委，各有创获。战国及秦汉之际撰著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礼记》中的《学记》、《儒行》等篇章便有对晚周学术的综述、分论和评议，成为学术史的嚆矢。汉代刘安主持编著的《淮南子》中的《要略》等篇，司马迁《史记》中的《论六家要指》、《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篇，班固《汉书》中的《董仲舒列传》、《司马迁列传》，尤其是《艺文志》、《儒林传》更以较为整齐、系统的文字，记载、评介周秦以来的各个学派及其著作、思想。循此传统，以后各代史书，分设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文苑传、道学传、方伎传等包含学术史素材的专章。此外，在各类文集的序、跋中，在学者们的随笔、札记中，亦多有关于前代、当代学术流变的记述和评判。唐宋以降，朝廷编纂大型类书、丛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集历代学术大成，为考析流变提供系统的资料基础。始于宋代而盛于明清，还有学术史专书的涌现，继南宋《伊洛渊源录》、《伊洛正源书》之后，明代有《伊洛渊源续录》、《闽学源流》诸书，明末至清代，更有叙述学派源流并对各学派学说略加论断的“学案”式著作纷纷创制，如《元儒考略》、《圣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儒林宗派》、《理学宗传》、《清学案小识》、《北学编》、《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以及民初编纂的《清儒学案》，便是其中的名著。至于佛教、道教则素来注重本宗教(及其内部各宗派)的衣钵授受、系谱传递、道术承袭的记录和研究。佛教“灯灯相传”的“传灯录”一类教派史著作，直接启迪了宋明以降诸“渊源录”和“学案”的编写形式。至近代，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则力图站在新学的高度，对中国学术史重加评判，并留下内涵丰富的论述。

四

前人对学术流变的追述、评论,当然都要受到自己学术观点的左右,见仁见智,各有创识。就总体而言,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在一元中又包蕴多元因子。这种进程也影响到各代学人评论学术流变的气度。在“处士横议”、“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期成文的《庄子·天下》,对先秦各学派并无特别的推尊和贬抑,关于诸子的分合变异及长短得失,都有较公允的评判,显示了学术多元时代的恢弘气象。以后,《史记·论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大体沿袭着这一传统,它们虽然承汉初思潮,显示了对道家的某种程度的偏爱,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对于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和优长缺失,都尽其可能地给予客观、平正的论列。当然,战国晚期也有学派性强烈的评议,如《荀子》、《韩非子》中论学术派别的几篇专文,党同伐异气息已渐趋浓厚,《荀子·非十二子》推重孔子、仲弓一派,抨击其他诸派;韩非斥儒士为蠹虫,而将法术之士加以抬举,但荀、韩毕竟尚未明确提出一个排斥异说的单线学统。两汉以降,随着“儒术独尊”的日趋明朗、定型,学者论学术流变大都逐渐落入儒学一脉独传的窠臼,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说,便开其端绪。到唐宋时期,更形成流行于士林的“道统说”。这个由韩愈的《原道》始作俑(该篇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统系),由宋代理学家完成体系的“道统说”,以正统和僭伪为尺度,规范中国学术的发展程序。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编制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二程”这样一个系列,被视作对“道统”的经典性归纳。道统说的基本思想是孔孟学说,尤以思孟学派为正宗,与此相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应排斥在中国学术正统之外。两宋以来,虽有叶适等人批评道统说,但学界主潮则是奉道统说为主臬的。清人熊赐履所撰《学统》颇有代表性,它以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

熹等9人为“正统”；闵子騫以下至罗钦顺23人为“翼统”；冉伯牛以下至高攀龙等178人为“附统”；荀子以下至王阳明等7人为“杂统”；老、庄、杨、墨、告子及释迦氏为“异统”^①。道统说的价值在于它大体勾勒出儒家主流；其弊端是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漠视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事实，甚至也未能公正界定思孟学派之外的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

晚明以来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中，不乏识见卓异的人物，他们虽然很少正面批判道统说，却能在自己的论著中挣脱这个范式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对某一时代的学术流变给予评述。这方面劳绩最著的是黄宗羲。他独立撰写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奠定基础，由其子黄百家、其后学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是中国最早的详尽而有系统的两部断代学术史专著。这两部书发扬王阳明“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②的反独断论精神，不拘泥于“正统”、“僭伪”一类衡量标准，清洗韩愈、朱熹等人在学术统绪上涂抹的神秘色彩和正统理念，着力于对明代及宋代、元代各学术派别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者生平、著作、思想加以考辨，尤其注目于师生授受对学术派别延绵、变易的影响，并有意陈列“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使“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③，并“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④，这就把学术流变的考察置于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尊重中国学术的多元潜质，敢于穷源竟委，博采兼收，正隐约预示着挣脱学术大一统枷锁的时代趋势。这是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在研究中国学术史时，格外看重黄宗羲并编《节本明儒学案》以求推广的缘故所在。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对中国学术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整理。其间编辑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由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

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传记类存目五》《学统五十六卷》提要。

② 王阳明：《答罗整庵书》。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

④ 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

要》，不仅对各种学术专著勾玄提要，而且对各学术派别的发展脉络作分门别类的述评，“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①，为中国学术流变的探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

近代学人致力学术史研究，超越古人的处所在于：视野更为开阔，观念及方法均发生近代转型。如对学术作分科解析，注意学术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考察中外学术的交互影响、比较中国学术与异域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之异同，等等。其间于学术史研究贡献突出的是梁启超，他抱着“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②的宗旨，注目于传统学术的再评估和新学术的输入。他写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计划十六章，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化之迹，但仅写出前六章而辍笔。梁氏晚年曾立下做“中国学术史的志愿”，撰写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断代或个案学术论著。后二书尤为精粹之作，于清学的渊源及演进脉络，条列明晰，论断每有创意。梁氏虽未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但他在关于中国学术流变全过程的宏观把握方面，确有过人能力。今日的流行说——中国学术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正出自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概括。以此为基础，现代学人多倾向于将中国学术流变分为前后衔接的七段：“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元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当然，这是就主潮而言，每一阶段又都保留着前代学术的流裔，并存种种与主潮相歧异的旁门别派。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办理四库全书历次圣谕》。

②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

与梁启超齐名的又一学术史家是章太炎。他辛亥前力倡“排满革命”时,即十分重视学术史研究,把中国学术称作“国粹”,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他对经学、史学、文字学、伦理学都提出若干新见,并对学术流变的成因独具慧眼。章氏在论及中国学术的歧变时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①认为“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材性”(人才素质)三者共同导致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的演化。章氏进一步指出,时代愈趋进步,人们交往扩大,而天才不世出,地理环境与人才素质的影响在缩小,对学术流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②这是确当之论——造成学术流变的因由,除应考虑“地齐”、“材性”外,更多地应当从“政俗”即社会因素方面深入挖掘。

另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则从“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的视角,探讨中国学术流变:将诸子学说光焰万丈的晚周称之“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两汉为停滞期,自六朝至唐宋,佛学入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又因宋儒的调和中西思想,此一受动时代“又稍带能动性”。宋以后至清,“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佛教又见告矣:西洋思想是也”。^③显然,王氏寄望于今日学术由受动于西洋思想,如能调和中西,则可达到能动境界。这是一种开放的、颇富前瞻性的学术流变观。循此思路,现代学术史家多注重周秦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三个历史转折期的学术演化,以之作为探讨中国学术流变的枢纽。

古人和近人对于中国学术流变的论述,或良或莠,或深或浅,却弥足珍视,因为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思维教训,奠定开阔而坚实的前进基地。

① 《原学》,《丛书》重订本。

② 《原学》,《丛书》重订本。

③ 《静庵文集》,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九十四页。

六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详尽占有材料。因此,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是切关紧要的。就学术史的研究而言,基本资料约略可分两类,一类为历代学术著作,另一类为历代学人论学术流变的论著。后者当然也是学术著作,但较之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它们直接表述了先贤对学术流变的看法,这为我们今天从事学术史剖析考辨提供了直接参考。即使是前人那些被时代的偏见所扭曲的看法,也折光镜似地反映了学术演变史的复杂面目,代表着某种时代思潮,因而也具有无庸忽视的史料价值。这些古今学人议论学术流变的文献,便是本书旁搜远绍的对象。

近几十年来,各类学术古籍整理出版甚多,经过编辑的哲学史、史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经济史、政治史资料书也纷纷涌现,其功德无量,但尚未得见一部历代学人论述学术流变的结集。我在从事文化史研究及教学工作时,常常以此为憾,因而萌生编辑这类书籍的想法。1988年与邓建华、彭池二君一起勉力编辑了《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仅印行1000册。此后十年间,时有学界人士来函寻索此书,表明这一资料书尚有社会需求。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和陈丽菲女士的盛意,此书获增补和重新出版机会。今次增补修订工作由邓建华与我共同完成;汪宇先生在最初曾居中联络过出版事宜,胡晓明先生也曾应编辑之邀提出过修订建议,成稿后,黄曙辉先生又做了不少文献校勘工作。

本书新版保留原版总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八部分,增加民国部分,共为九章。前八章中补入若干新篇目,包括台港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外国汉学家的论述,以扩大观察中国学术流变的视野。如学术活动主要在香港展开的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学术精神之发展,他说:“孔子承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开启之先秦文化之生机为